

优秀教材是怎样炼成的——人大社优秀教材丛谈

前不久,国家教材委员会发布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奖38项,总数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排名第一。人大社现约请获奖教材的主编、作者撰文或受访,回顾这些教材的编撰历程,总结参与教材编写工作的经验和感悟,以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同人和读者分享。以下刊出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辑。

服务高等教育事业 打造高质量教材体系

■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在最近揭晓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奖38项,总数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排名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从创刊以来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立社之本。助力高校学科建设、支持教学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是人大社一以贯之的教育出版理念。

人大社的教材建设始终坚持以

国家发展大局同行,在不同时期以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教材精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大社的教材紧紧契合新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新实践和新气象,为新中国新型正规大学教育的创办奠基;改革开放开始后,紧跟国际学术前沿,译介海外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腾飞助力;新世纪以来,以建设具有人大特色、学科齐备的高校文科本科教材体系,为提升中国软实力、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在这一过程中,人大社与大批优秀学者和一线教师共同成长,相互成就。人大社见证了诸多学科开山、扛鼎之作的诞生,也记录了许多名家大师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治学历程。人大社陪伴了一批学术中坚力量的成长,也让许多优秀教材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很多人大社经典教材的新版修订者都曾表达,自己是在第一次接触这部教材的时候还是学生,教材为他们开启了治学

的大门,他们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并在有一定收获和成就后欣然加入当年哺育过自己的教材的编修队伍,为教材的不断完善贡献智慧。

致力于教育出版六十余载,人大社的教材建设积累了与理论创新共生共长,与实践发展齐头并进的出版特色:一是坚持正确导向,教材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弘扬时代精神,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反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技术最新突破、学术研究最新进展。二是敏

锐捕捉学科发展和产业实践前沿新现象、新问题、新变化、新动向,以前瞻的眼光更新编写队伍,升级教材内容。三是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目标实现体现在各学科教材编写中,全面阐述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学术体系。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

切。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人大社将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继续秉承服务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完善教材编审专家库,确保所有教材均由名家大师领衔编写,不断紧跟一线教学需要,加快教材多媒体融合形式开发,并继续坚持用优质的编辑力量、严格的流程管控来打造高质量教材体系,为高等教育事业提供强有力的出版支撑,为我国迈向教育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方汉奇先生与《中国新闻传播史》编修历程

■王汉威 李 静

作为获得全国教材建设奖唯一一等奖的新闻传播类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领域的开山扛鼎之作,亦被国内诸多高校的新闻院系所采用。从新世纪初编纂完成并出版,到如今第3版付梓,二十年的出版历程背后是教材主编方汉奇先生半个多世纪教学、研究的汗水与精华。

方汉奇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始人、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在他看来,这部教材的编纂有其时代的必然性。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整体规模较小,“当时全国只有四五家院校开设新闻专业,一百余名学生,新闻史课程每周也只上一次”,而编纂一部教材是一个投入较大的工程,因此在方汉奇先生看来,那时编纂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必要性并不突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新闻史教育依赖的文本基本都是像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以及姚公鹤的《上海新闻小史》这样相对来说内容不够丰富的作品。方汉奇先生曾走访国内各大高校图书馆,旧书店搜集报纸资料,在北京大学,方先生得知彼时图书馆馆长向达藏有《湘江评论》四则,然而向馆长不愿外借,方先生就在其办公室翻阅完成备课。此外,方先生走访北京各书店,在报纸称斤卖几毛几分的彼时,斥“巨资”购入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湘江评论》某期(后方先生得知该期为翻印版,不免有失望之感)。并用卡片将其中有价值的报刊史料记录下来,用于后续的研究。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才组织了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编写了第一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并派四位老师分别赴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相关内容,两校也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分别编写了供内部教学使用的讲义。1956年初,四位专家又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

本内容。在当时新闻教育格局较小的背景下,古代、近代的新闻史教学依托戈公振等人的著作,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的新闻史教学则依托于上述材料,再加上方汉奇先生边搜集、边备课、边研究的长期积累和《新闻战线》《新闻业务》等期刊在特定时段刊载的一批新闻史论文,构成了彼时新闻史教育内容的基本格局,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的编写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进入发展快车道。报纸、广播、电视数量和内容快速膨胀,实践诉求大大增加,招生规模相应扩大,新闻史作为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既有的材料已经不足以满足规范化、现代化的新闻史教育的需要。一方面,以《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一系列民国期间的著作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的史实,但内容不多,并且囿于时代的限制存在一些不甚规范之处;另一方面,既有的从党史和革命史出发的研究和之前新闻事业之间尚未达成良好的衔接,新闻史研究教学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还有待提升。“不能老是参考人家的,要有自己的。”方先生如是说,所以,一本高水准的、能满足国内新闻院校教学需要的新闻史教材成为了学界期盼的必要基础工程。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盛世修史”的传统在新闻传播学界也开始彰显。另外,各地纷纷开始修撰地方志,其中新闻志的部分大多由各地退休的老媒体人主持修订,这也为新闻史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材料支撑。同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为教材编纂提供了有生力量。此外,前期学界广泛开展的各样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尤其是1989年4月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也为教材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一支由方先生领衔的强有力的教材编写队伍应运而生。第一版的编写团队还包含丁渔林、黄瑚、薛飞三位作者,丁渔林和黄瑚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薛飞当时为人大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第二版于

2009年6月出版,作者团队在第一版四位编写者基础上新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王润泽、赵永华、赵云泽及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编辑的杨雪梅。第三版于2014年7月出版,作者团队同第二版。整个编纂队伍集中了学界界的精英力量,同时编纂过程中充分参考和借鉴已出版的同类教材。

教材叙述内容广泛,涵盖了从中国自先秦两汉以迄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对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民国初年的新闻传播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总体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清晰描述了新闻传播活动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过程,涉及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新闻传播学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囊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该书叙述系统详赡,勾勒出了先秦两汉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全貌,在全景式反映中又注重求新和求精,内含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规律的审视,即宏观上脉络清晰,微观上能见度高,让读者能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有全面的多方位的了解。该书史料丰富翔实,尤其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颇多创获,真实可靠,堪称“信史”。教材一经出版,就在学界获得盛誉,先后获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累计发行40余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

对这样一部影响深远卓著的关键教材,方先生表示:“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只是尽力而已。当时组建队伍时把能吸收的力量都吸收进来,大家合作,各取所长,每一位撰写者都有重要的贡献。”此外,方汉奇先生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工作表示了肯定。“新闻事业在发展,新闻史教材也需要不断完善。”在采访的最后,方先生这样说,《中国新闻传播史》随着我国媒体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而年近百岁的方汉奇先生亦宛如这本教材,每天坚持学习,积累,继续向着更高的学术山峰发起挑战。



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编修的往事今情

■杨达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宋涛老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2版)获得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一等奖。该书自1982年初版,至今已过去39年了,历经13次修订,累计发行达数百万册。该书刚面世时,我还是宋涛老师当系主任时的经济系的研究生。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虽已经有了徐禾老师等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但它只有资本主义部分。其他由全国各地高校教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虽各有特色,但终究不是人大本校老师编的。宋涛老师该书的出版,让我们有了自己学校老师编著、自己学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基础课教材。

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受教育部政教司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委托,编写作为高等学校文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课教材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老师担任主编,组织当时人大经济系的骨干教师集体编撰。在各位老师完成初稿后,宋老师统稿、修改、定稿,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1982年1月出版发行。

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程几经变化,人大出版社及时推出适合最新课程设置的教材。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老三门”(哲学、政治、历史)改为“新三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史),1990年代的“新四门”(哲学、政治、历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个概论),21世纪初的“新新四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人大社都及时推出新教材,并被全国许多高校采用,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从编写时就确定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也作为经济学及相关专业学生用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在实际使用中也是这样,无论是“老三门”时期还是“新四门”时期,《教程》作为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固然不少,当作经济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的则更多。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教程》主要是作为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来修订和使用的。

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能在39年里长盛不衰,受到社会和使用者欢迎,维持相当的发行量,与其科学性、理论性、现实性、适用性相结合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科学性上,宋

涛一贯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要经得起实践检验。在理论性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原本本阐释基本原理。在现实性方面,则紧密联系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补充新内容,修改已经过时的材料、数据,纠正已被实践证明不准确的表述。适用性则体现在《教程》不但可作为政治理论课教材,也完全适用于经济管理类专业作为专业基础课教材来使用。尤其在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和高校经济类教学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当下,有一本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对经济类学生是非常必要的。

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出版39年,历经13次修订,全书框架、基本结构、章节内容做过多次与时俱进的调整、补充和增删修改。每次修订都按照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最新精神,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把新的理论成果和实际例证补充进《教程》。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容,既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论观点,又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断总结、补充新的内容。每次修订的重点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篇章。记得第一版发行不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新理论、新措施。编著者和出版社一致认为,应该对第一版进行修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论述,要与中央保持一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教程》也及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宋老师虽年事已高,但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新现象、新问题,政治经济学应该予以及时回应。他多次嘱咐编写者、修订者要与与时俱进,及时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把相对成熟的理论成果补充进《教程》修订版。党的十八大以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虽然宋老师已过世,但编写组在几位副主编的带领下,还是按照宋老师一贯做法,及时修订。

以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2版修订为例,即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内容上加强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的分析,着力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内涵和伟大历史意义,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点、新方略和新征程。

2021年初,该书修订第13版出版。这次修订,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立场和坚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编写高等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要求,对全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新增了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有关经济方面的一些新论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提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内容,体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及2020年全国两会的精神。

第13版在内容上加强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和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全书着力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内涵和伟大历史意义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点、新方略和新征程,围绕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改善民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作了较多分析。

39年13次修订,我也从一个学习《教程》的研究生,到加入编写者队伍,再到成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却依然参与修订的退休老教师。以此小文,介绍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编修的往事今情,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变化吧。



理论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郑杭生教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获得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一等奖。该教材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社会学界广泛欢迎,累计发行量高达200万册。我作为一个从第一版开始以来各个版本的参与写作者和第五版的执行主编,回想起这部教材最初的设计和写作,颇多感慨。

这本教材的第一版名为《社会学概论新编》,后来因为修订才改名为《社会学概论新修》。1985年,中

国人民大学成立社会学研究所,郑老师担任研究所所长。当时,社会学在国内刚刚恢复不久,学科建设任务繁重。人大社会学在研究所及招收硕士生研究生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社会学系,准备在1987年招收本科生。郑老师敏锐地认识到,学科建设的中中之重是教材建设,而教材建设首先是社会学概论教材建设;另一方面,本科招生的当务之急也是社会学概论课程和教材的建设。因此,郑老师亲自领衔并具体组织,

开始编写社会学概论的教材。当时,社会学概论的教材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版本,其中有些教材或是由著名的社会学家编写,或是因特色突出而影响较大,国内学者也编写出版了若干影响很大的优秀概论教材。因此,如果人大要编撰社会学概论教材,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所创新和形成特色。应该说,郑老师极为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社会学概论新编》的最大特色,就是整本教

材的编写是建立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上。当然,任何概论教材都有一个阐释基本社会学概念的框架,这些框架的基本特色是在社会学概念的范畴内建构阐释框架。而《社会学概论新编》则是基于一个与与众不同的阐释框架,即将社会学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之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背景下揭示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并以此建构社会学概论的阐释体系。为此,郑老师做了深入的理论准备和创新性的理论贡

献。1985年,他发表了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论文;1986年,又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年,与《社会学概论新编》几乎同时,出版了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学定义,即: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在此基础上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著述中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同

样著名的“社会运行论”。《社会学概论新编》的核心概念和阐释框架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上的创新性探索形成的,而且这一核心概念和阐释框架一直在后来的修订版次中延伸下来,包括《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

从《社会学概论新编》到《社会学概论新修》的历程表明,一本教材,一个理论,乃至一个学科,只有立足于理论创新和本土实践,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